西亚北非乱局与西方的“新干涉主义”

安惠侯

内容提要：阿拉伯世界出现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原因十分复杂。这场动荡可能启动阿拉伯民众寻求新的发展道路的历史时期。当下这轮动荡由乱到治尚须时日。美国等西方大国积极介入，推行“新干涉主义”；海合会国家多方配合西方大国，致使局势复杂化。动荡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新干涉主义”遭到抵制，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能力呈减弱趋势，但其主导地位尚未发生根本动摇。

关键词：阿拉伯国家　政治和社会动荡　西方新干涉主义

2010年底肇始于突尼斯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一度席卷阿拉伯世界，除卡塔尔和阿联酋外，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都发生过群众抗议运动。该地区的六个国家受冲击最大：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被迫出逃国外；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国内外双重高压下宣布辞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被击毙，政府被推翻；巴林群众抗议活动被武力平定；也门总统萨利赫通过“让权”换取“豁免”，由副总统哈迪继任总统；当前，叙利亚成为西方大国打压的重点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此外，伊朗与美国的矛盾继续发展；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和谈仍陷僵局。西亚北非地区乱局呈现长期化和复杂化的趋势。

一、地区性动荡与西方的“新干涉主义”

综合来看，席卷这一地区的动荡主要反映了有关国家国内诸多矛盾的全面激

安惠侯　前驻埃及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

化。一是物价上涨，就业困难，民生艰难。如突尼斯15—29岁的人群失业率高达52%，埃及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门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二是强人长期执政，高度集权，贪污腐败，不思改革，缺乏民主，激起民众强烈不满。本·阿里、穆巴拉克、萨利赫和卡扎菲分别执政长达23年、30年、33年和42年。三是美国的中东政策伤害了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和感情，而一些阿拉伯当权者反而予以配合，使得阿拉伯民众有着强烈的失落感和屈辱感。最先出事的恰恰是与西方关系良好的突尼斯和埃及，令人深思。四是一些国家固有的部落、教派、民族矛盾激化。五是伊斯兰极端思潮和西方国家极力推行的“民主”、“自由”思潮从相反的两个方面对阿拉伯社会形成冲击。多种因素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激烈动荡，反映了阿拉伯民众对国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停滞不前的强烈不满和要求变革，期盼发展，寻求新的民族复兴道路的强烈愿望。发生动荡的阿拉伯国家既有共同的原因，情况也不尽相同。

上述种种导致动荡的因素长期存在，此时集中爆发，国际因素起了推动作用。一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剧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困难，导致物价上涨，失业率居高不下，致使民生问题点燃长年积累的民众愤懑的干柴，形成燎原之火。二是美国因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经济危机等因素，开始从其霸权的顶峰坠落，对国际事务主导能力减弱。奥巴马总统调整政策，将美全球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在中东地区实行战略收缩，投入减少，主导能力也相应减弱。三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群体性崛起，对阿拉伯国家产生强大的示范和激励效应。四是互联网络的普及，给抗议民众的串联提供了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的集团发布不实消息，操纵舆论，挑动民众，火上浇油成为可能。

对阿拉伯世界发生剧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美国始料不及，担心动荡危及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利益。为防止出现反美和反以色列倾向，美国极力将动荡引向“反独裁”、“反暴政”的“民主运动”，高调宣传“阿拉伯革命”、“阿拉伯之春”，抢先为动荡定性、定调。由于西方大国掌控了国际话语权，美国的定性、定调不仅抢占了先机，并且垄断了舆论。随即，美国利用动荡之机，推行“新干涉主义”，极力引导各国动荡的发展方向，并强行更迭对美不驯服的阿拉伯政府。第一，美国开始力保长期以来的盟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但随着埃及民众抗议活动越演越烈，美国担心局势失控，转而压穆巴拉克辞职，将权力交给美国信赖的埃及军方，以确保美对埃及的控制。第二，在巴林，掌权的逊尼派穆斯林占人口的25%，75%的无权的民众为什叶派穆斯林并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有着密切联系。巴林什叶派民众的抗议活动引起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担心，也令美国不安，担心巴林什叶派得势会导致伊朗影响的扩大。于是美国默许沙特、阿联酋联手出兵，对巴林抗议民众实行军事镇压，将抗

为防止出现反美和反以色列倾向，美国极力将动荡引向“反独裁”、“反暴政”的“民主运动”，高调宣传“阿拉伯革命”、“阿拉伯之春”，抢先为动荡定性、定调。

议浪潮平息下去。第三，“基地”组织在也门颇为活跃，萨利赫总统在反恐方面一直积极配合美国。同时，美国担心也门演变成部落势力割据，四分五裂，群龙无首的又一个索马里。因此，美国联手海合会国家让萨利赫用“交权”换取“豁免”，形成了“也门模式”，对萨利赫网开一面，留有余地。萨利赫的副总统通过选举继任总统之职，萨利赫的亲信仍掌实权。第四，在利比亚，主要是长期积累的部落矛盾激化形成动乱，而卡扎菲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府后，已经向美等西方国家认输服软，但美、欧仍不放过这位桀骜不驯并极力在非洲扩大影响的“另类”领导人。它们夸大卡扎菲对反对派的镇压，对利比亚实行制裁，随后又利用并超越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对利比亚发动空袭战，支持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扩大内战。最后由北约国家提供武器并派出地面部队，直接指挥反政府武装力量击毙卡扎菲，推翻政府，制造了“新干涉主义”的“利比亚模式”。美国对此模式颇为得意，一些政要和媒体毫不掩饰继续推行这一模式的冲动。该模式包含如下内容：一是培植一支决心推翻政府并拥有挑动内战能力的反对派；二是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三是盟国广泛参与，甚至愿打头阵；四是以“支持民主、反对暴政、保护平民”为旗号进行干涉，强行政权更迭。第五，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正极力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企图通过政治、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制裁，大力支持和武装反对派扩大战乱，威胁施行军事干预等各种手段，压巴沙尔下台。

此外，美国与伊朗的矛盾也在加剧。不容许任何力量挑战美国的霸权，是美国既定国策。伊朗自伊斯兰革命后，鲜明反美、反以色列，并利用美陷入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机，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现又积极发展核技术，还有意组成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势力的“伊斯兰什叶派新月联盟”。美对伊朗的上述种种政策无法容忍，视伊朗为最大的威胁。为瓦解伊朗伊斯兰政权，孤立、制裁、颠覆各种手段美均无所不用其极，但始终不能奏效。近几年来，美国和以色列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出军事打击伊朗的威胁，但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因为军事打击伊朗的后果实在太严重，难下决心。美国与伊朗的矛盾难以化解。美等西方国家打压叙利亚显然也是要制衡和削弱伊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以色列坚持扩大定居点建设，对巴勒斯坦态度强硬。奥巴马出任总统后一度积极推动巴以和谈，但因以色列拒不妥协，巴以和谈长期陷入僵局。奥巴马也不能改变美国偏袒以色列的一贯立场。阿拉伯世界发生激烈动荡后，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和支持减弱，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

在西方推行“新干涉主义”的过程中，海合会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企图借助西方大国之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西方推行“新干涉主义”的过程中，海合会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企图借助西方大国之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海合会国家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虽然也存在君主专制、保守落后、缺乏民主、贫富悬殊等社会弊端，但民众的生活水

平要比其他阿拉伯国家高出不少。动荡开始后，在一些海合会国家也曾爆发抗议游行。沙特等国政府立即拨巨款安抚民心，平息抗议浪潮。美国一直视海合会国家为其在中东的战略盟友，极力维护这些国家的稳定。巴林什叶派的抗议运动及时被镇压下去后，在剧烈动荡的阿拉伯世界，海合会国家总体上保持了稳定。海合会国家民众以伊斯兰逊尼派为主，但也有相当的什叶派民众。沙特、卡塔尔、科威特国内的什叶派民众分别占它们总人口的15%、16%和25%。沙特等海合会国家与伊朗长期不和，既有地缘利益分歧，也有教派矛盾。伊朗坐大，发展核技术，筹组“伊斯兰什叶派新月联盟”，在中东地区影响上升，引起海合会国家担心。海合会国家要利用西亚北非动荡之机，借助西方的力量，确保自身安全，掌控阿盟，排除异己，确立在阿拉伯世界的主导地位。它们配合西方大国推翻了一贯与海湾君主国作对的卡扎菲，现在又联手西方大国压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下台。因为叙利亚与伊朗关系密切，又由占人口少数的什叶派掌权。海湾国家对突尼斯、埃及等国逊尼派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持支持的立场。海合会6国中，以沙特和卡塔尔最为强硬。它们的极端言行，以及阿盟在这些国家主导下作出的一些决定，并不是阿拉伯国家的共同立场，也被认为并不符合阿拉伯民族的根本利益。

二、如何定性阿拉伯国家的变局

对阿拉伯世界的这场动荡，美国抢先广为炒作“阿拉伯之春”、“阿拉伯革命”，影响深广。伊朗对这场动荡兴高采烈，认为是伊朗式伊斯兰革命的再现，期待“伊朗模式”在中东全面复制。“基地”组织也欢呼这场动荡，呼吁伊斯兰极端势力推翻世俗政体，建立伊斯兰政权。参与抗议的民众也自认为是在进行革命，如埃及民众打出“大饼革命”的口号，旨在突出他们行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不同的势力根据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对这场运动进行解读和定性。

中国的媒体经过短暂的混乱后，趋同于将其定位于政治和社会动荡，或者称之为“变局”、“变革”、“危机”等。但也有人接受“阿拉伯之春”和“阿拉伯革命”的概念。笔者认为，首先，这场动荡充分暴露了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众多矛盾，显示了阿拉伯民众求新、求变，寻求合适的发展道路的强烈愿望，有可能开创阿拉伯民众寻求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公正民主，外交独立自主的新的发展道路的历史时期。这种诉求当然值得尊重和肯定，但这将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必然要经历多次曲折和反复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大动荡与大变革有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主旋律。这次动荡主要冲击了一些共和制国家，下一轮动荡也可能会冲击君主制国家。在这历史过程中有可能在一些国

这场动荡充分暴露了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众多矛盾，显示了阿拉伯民众求新、求变，寻求合适的发展道路的强烈愿望，有可能开创阿拉伯民众寻求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公正民主，外交独立自主的新的发展道路的历史时期。

家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人们期待在经历大动荡和大变革之后，一个繁荣、强大、文明、进步、独立自主、充满活力的新阿拉伯世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目标不可能短期实现。现在就认为出现了“阿拉伯之春”、“阿拉伯革命”似为时过早。西方大国的炒作别有用心，我们不应呼应。政治和社会动荡是一个中性的开放性的概念，事态可能向革命的方向发展，也会演变成动乱，或者，像在利比亚那样，引发外国的军事干涉和入侵。其次，当前事态原因复杂，目标多元，发展方向尚不确定，其爆发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草根性”，没有统一而明确的纲领，也不是由某个政党或团体发起，只是在动荡爆发成势之后，军队、伊斯兰势力、民主派势力、精英阶层以及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才先后积极介入，施加影响，力图推动动荡向各自需要的方向发展。第三，在突尼斯和埃及，民众因不满举行抗议，最终导致最高领导人下台，政权更迭，确有一些“革命”的特点。然而，在巴林主要是教派矛盾；在利比亚主要是部落冲突；在也门既有部落矛盾，又有南部分裂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还有基地组织的介入；叙利亚除了社会和政治矛盾外，还存在着教派矛盾和民族矛盾。第四，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全面介入，推行“新干涉主义”，使得事态改变性质，利比亚局势由群众广场抗议演变成西方大国的军事干预和入侵。叙利亚的局势，又何尝不是“新干涉主义”的肆虐盖过了群众的广场抗议。将动荡视之为“革命”最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至少在客观上配合了西方的舆论导向和“新干涉主义”的实际运作。

值得关注的是，这场政治和社会动荡影响深远，将长期化和复杂化。

（一）政治格局大变，伊斯兰势力崛起。在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已经出现的变化，一是政治多元化。一党独大，一党专政的体制被废除，多党涌现，并通过选举争夺执政权。二是民族情绪高涨。要求独立自主，反对外国干涉；反对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这一点在埃及尤其突出。三是伊斯兰势力崛起。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通过选举成为第一大党，并出面组阁。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属下的自由和正义党在议会选举中领先，获得47.2%的议席，另一个伊斯兰政党光明党紧随其后。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势力同样发展。摩洛哥议会提前选举，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成为第一大党，由国王授权组阁。伊斯兰势力在科威特也主导了议会。利比亚尚未举行大选，但过渡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斯兰教法将是今后制定法律的基础。在推翻卡扎菲的战争中，伊斯兰武装力量发挥了主要作用，在今后的政治舞台上，也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各派势力争斗加剧，政局难以稳定。在阿拉伯国家，军队组织严密，是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的重要力量，也是过去强人统治的支柱。强人被推翻后，由军队控制局势。军队直接执政的时代已经结束，它们只能退居幕后。伊斯兰势力是除军队外，组织最严密的力量。伊斯兰势力在动荡中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阿拉伯国家内世俗势力还有相当的影响，多数民众也不接受极端思潮，伊斯兰势力要想发展，必须采取温和路线并与世俗政党联合执政。因此，短期内不会出

现伊朗式的政教合一体制。世俗民主派势力也在发展。这股势力又分民族主义派和亲西方派。阿拉伯民众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亲西方派不可能博得广大民众支持。选举结果显示，民主派势力不占优势。此外，还有推翻强人统治的广场抗议的主力军——青年群众，他们徒有一腔热情，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共同的政纲，没有公认的领袖，在突尼斯、埃及议会选举中没有斩获，很感失落。这几股力量在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制定何种政策、由谁发挥主导作用等方面的争斗已经全面展开，并可能激化。至于“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也在趁乱发展，但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也不为西方大国容忍，不可能成为参政力量，但其破坏能量不容忽视。此外，埃及还有穆斯林与信仰东正教的科普特人之间的矛盾；利比亚有部落之间和各武装力量之间的矛盾；叙利亚有伊斯兰教派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一旦激化很难缓和。引发抗议浪潮的种种矛盾，均未能解决。这一切决定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局势动荡将长期化，还可能向其他国家蔓延。

（三）经济重建举步维艰，民众生活更加困难。经济和社会重建需要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执政的权威。而派系林立争斗，教派、部落矛盾难解，民众无政府主义倾向严重，以及西方大国的插手干预，使得局势难以稳定，政府权威难以建立，经济重建也就步履维艰。政局不稳导致境外投资减少，生产停滞，旅游者望而却步。2011年第三季度埃及吸引外资44亿美元，是2010年同期16亿的四分之一。旅游收入2011年仅88亿美元，比2010年的125亿美元下降30%。政府公布的数据2011年第二季度失业率为12%，分析人士认为，实际失业率远高于此，青年人失业率高达25%。突尼斯的情况与埃及大同小异。也门的情况更糟。埃及媒体调侃称：埃及人更自由了，却也更加贫穷了。

（四）非阿拉伯国家处境和态度各异。西亚北非地区除了阿拉伯国家外，还有三个重要的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伊朗的情况上面已经谈到。土耳其积极介入中东事务，推行它的发展模式，对巴沙尔政权态度强硬，极力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但因奥斯曼帝国曾占领广大阿拉伯国家，对其继承者，阿拉伯国家始终保持戒备。土耳其的影响在扩大，但要想在以阿拉伯国家为主体的中东地区发挥主导作用恐非易事。至于以色列，它因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国家崛起，伊朗影响扩大并发展核技术，深感不安，又因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而庆幸。它对伊朗发展核技术高调发出军事打击的威胁，而对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一直保持低调，以惴惴不安的心态注视事态的发展，尤其担心邻国埃及、叙利亚等国因政权更迭而改变对以政策，危及以的安全。

三、叙利亚危机成为地区局势发展的风向标

叙利亚危机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西方媒体掌控了国际话语权，许多真相被扭曲。应该尽力搞清楚叙利亚问题的真相。（一）巴沙尔政权并非众

叛亲离已成为孤家寡人，而是仍然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中国媒体人估计，60%到70%的民众支持政府。法国《费加罗报》认为半数以上的民众支持巴沙尔。黎巴嫩学者估计，3成人反巴沙尔，3成人支持，4成摇摆。《华盛顿邮报》2月25日曾刊文指出，许多观察者称这位总统在叙利亚依然拥有坚定的支持者。（二）暴力事件难以停息原因何在？叙利亚政府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西方大国要求叙政府单方面停止镇压，将军队撤出城市，同时大力支持并武装反对派拒绝对话，加强暴力挑衅，制造更多的伤亡，然后把责任全部归罪与政府，为西方进一步干预提供借口。这应是暴力冲突无法停止的主要原因。（三）巴沙尔政权并非是变革的阻力。叙政府已经采取许多改革措施，最突出的是修改宪法并于2月26日付诸全民公决，投票率为57.4%，支持率高达89.4%。普遍认为公决的结果基本可信，显示了既要求变革，又反对战乱的主流民意。叙利亚政府宣布5月7日举行议会选举，欢迎反对派参加竞选。这将是又一重大的变革举措，值得期待。而西方大国只要求巴沙尔下台，强行实现政权更迭，并不关心是否实施改革，也不真正关心减少平民伤亡。（四）反对派派系众多，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如果没有外力的军事干预，反对派不可能推翻巴沙尔政权。（五）阿拉伯国家对叙态度并不一致，阿盟被沙特、卡塔尔等少数国家把持。阿盟涉叙决议明显不符合阿拉伯民族的根本利益。黎巴嫩公开反对阿盟对叙决议，突尼斯总统在“叙利亚之友”会议上明确反对武装叙反对派和外国军事干预叙事务。3月16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三个经历了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在突尼斯举行外长会议并发表联合公报重申，叙利亚的流血冲突必须停止，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军事干涉，希望叙利亚问题在阿拉伯框架内解决。沉默的多数已经并将继续发声。（六）国际社会在涉叙提案在联合国安理会被中国和俄罗斯否决后，反对军事干预，主张有关各方停止暴力，通过对话，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呼声日益高涨。

笔者认为，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将面临三个可能的前景。（一）继续加大变革步伐，逐步稳定局势，开启与多数反对派对话，实现包容性的政治解决，形成“叙利亚模式”。这正是中国、俄罗斯以及联合会和阿盟的特使安南正在积极推动、促成的事。中国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六点主张，不仅被叙利亚政府接受，还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支持。但是，西方大国不愿看到这种结果，极力阻扰，叙反对派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拒不妥协，这种可能虽有希望，但短期内难以实现。（二）西方复制“利比亚模式”，用军事手段推翻巴沙尔。这种可能性不大。一是叙反对派力量太弱；二是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而且多数阿拉伯国家反对；三是美、欧大国经济困难，民众反战，又面临总统大选，无力发动新一场战争；四是打利比亚引发了利比亚战争，如果打叙利亚可能引发一场中东战争，后果十分严重。（三）在前两种可能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反对派无力推翻政府；政府也难以剿灭得到西方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支持的反对派，危机拖延下去。这又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叙政府处置得当，逐步过渡到第一种可能；一是巴沙尔被拖垮，

接受“也门模式”。巴沙尔政权处境困难，但并未陷入“穷途末日”。总之，如果第一种可能前景得以实现，阿拉伯世界的乱局有可能走向阶段性的缓和。如果西方在叙利亚推行“政权更迭”得逞，“新干涉主义”会更加嚣张，势将确定下一个目标，西亚北非地区动乱将继续并加剧。

但是，西方的“新干涉主义”并不会所向披靡，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作用或将继续受到削弱。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长期在中东发挥着主导作用。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美深陷战争泥淖，加上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美国从霸权的顶峰向下坠落。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能力相对减弱。为了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奥巴马总统调整政策，做出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决策，并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然而，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2012年2月28日出席参议院2013财年外交预算听证会上，提出美国外交的五项重点内容，将“继续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执行安全任务”列为首位；其次是在“亚太推行前沿部署外交政策”；第三项是“关注阿拉伯世界的改革，向一些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重新将大中东地区放在美国外交的首要地位，明显与“重返”亚太的决策相悖。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外交决策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心态和力不从心，顾此失彼的尴尬？

在西亚北非，美正大力推行“新干涉主义”，固然是出于利用“巧实力”的思路，但也可看作是面临难题太多，必须利用外力的无奈之举。“新干涉主义”不管有多“新”，多“巧”，实质仍然是干涉别国内政，根据大国的利益和好恶，强行政权更迭，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自行选择发展道路，反对外来干涉的立场针锋相对，不可能不激起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和抵制。对多数阿拉伯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利比亚模式”已成为决不应该再被复制的负面模式。当今时代的主流是要和平，求发展，谋合作。西方国家打着保护平民，维护人权的旗号，对不听它们指挥的中、小国家肆意实施制裁、以武力相威胁，甚至实行军事干预，强行政权更迭。这种逆历史而动的行为必将受到国际社会日益强烈的谴责。阿拉伯民众一直有着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在这场动荡中的所作所为只会加强反美情绪。伊斯兰势力在政治和社会动荡中崛起。它们虽然以温和的面目出现，美国等西方大国也在积极地对它们施加影响，但伊斯兰势力，即使是温和派，它们的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也与美国的霸权政策格格不入。伊斯兰势力壮大和民众的民族情绪高涨，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加强。动荡后的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像以往那样配合

“新干涉主义”不管有多“新”，多“巧”，实质仍然是干涉别国内政，根据大国的利益和好恶，强行政权更迭，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西方大国推行的“新干涉主义”将遭到越来越明显的抵制，美国在中东的主导能力会继续减弱。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短期内尚不会发生根本动摇。

美国的中东政策。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就是一例。西方大国推行的“新干涉主义”将遭到越来越明显的抵制，美国在中东的主导能力会继续减弱。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短期内尚不会发生根本动摇。

结 语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没有任何历史积怨。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经过60多年国际风云变幻，不断巩固和发展。近几年来，在美国的霸权主义对中东造成巨大破坏，美国主导国际事务能力下降，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上升，中东国家正在寻求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大背景下，阿拉伯国家“向东看”倾向加强。阿拉伯国家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合作的愿望日益迫切。

阿拉伯国家发生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后，中国本着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尊重民众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主张通过对话，政治解决分歧和矛盾，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危机，反对外国干涉，反对强行政权更迭。中国的立场完全是从有关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出发，不谋求任何私利，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刻意反对任何一方。中国的立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得到日益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和民众的理解和赞扬。中国无私的立场定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